

# 創造的張力：在理念與資源之間

◎ 許紀霖

自從林毓生教授提出「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命題以後，一直成為海內外學術界討論的熱點。有將其作口號式庸俗化利用的，亦有對其產生誤讀而加以批評的。我本人在80年代也曾經寫過一篇多少是基於誤讀的批評性文字<sup>①</sup>。類似這樣無的放矢的批評，當時在大陸學界並非我一個，箇中的緣由自然主要是因為大陸彼時的知識背景、學界風氣和批評者的學識膚淺使然，但同時也是由於林教授在提出這一流行甚廣的觀念時，未及在學理上作出更周密的論證和限定所致。

所幸的是，最近我們終於讀到了他關於「創造性轉化」的「再思與再認」的文章。林教授明確指出：所謂「創造性轉化」，是指以多元的思考模式，將中國傳統中的一些符號、思想、價值和行為模式選擇出來，加以重組或改造，使之成為有利於革新的資源，並在這一過程中獲得新的認同。他特別強調，「創造性轉化」並非一個整體

主義理性設計的藍圖，而只不過是一個價值選擇中的導向而已<sup>②</sup>。

我以為，林教授的澄清和限定是很有意義的，它與這幾年人們對「創造性轉化」的種種批評，如一元論思想模式、整體主義理性設計等等，在學理上初步劃清了界限。不過，要使「創造性轉化」這一富於挑戰性的命題不流於口號或招貼，不僅在操作層面，而且在學理層面同樣有大量的研究尚待進一步落實。

## 現代化的理念、經驗與資源

「創造性轉化」這一命題雖然是林教授的創意，但其基本依據乃出自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家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博蘭尼(Michael Polanyi)的自由主義理論。這些英美自由主義大師，以各種理論話語強調一個有生機的文化歷史

「創造性轉化」這一命題雖然是林毓生教授的創意，但其基本依據乃出自西方思想家海耶克、懷海德、博蘭尼的自由主義理論。不過，海耶克等人的語境與我們所面臨的語境是截然不同的，這也使得「創造性轉化」這一命題，比其所憑藉的理論依據有着更複雜的內涵。

傳統對於建立民主自由秩序的重要性。不過，海耶克等人的語境與我們所面臨的語境是截然不同的，這也使得「創造性轉化」這一命題，比其所憑藉的理論依據有着更複雜的內涵。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現代化不過是其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結果而已，其資源無需外援，在自家的有生機的傳統中發掘便足矣。但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後發展國家來說，現代化從發生學層面而言，卻是西方示範效應和強權刺激的結果，是先有現代化的理念，再艱難地積累現代化的經驗。這就出現了現代化的資源問題。外來的理念固然也是一種資源，但理念僅僅只能提供一種形式上的普世性價值趨向，至於資源的內容方面，只能是一種在本土歷史上已經存在的特殊的經驗性事實，也就是物化的或精神的傳統。然而在我們的傳統裏面，畢竟沒有現成的、直接的、在性質和功能上都足以支撐現代化的「支援意識」，於是就發生了一個資源的再生產命題，即「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在西方，現代化的抽象理念與經驗事實是具有同一性的，或者說理念不過是歷史的經驗事實的形而上抽象而已。但在中國，現代化的理念卻是橫向移植而來，孤零零地懸在半空，所有的經驗性事實有待人們落實安排，所有的資源有待重新發掘整理。在這一「創造性轉化」過程中，最困難的莫過於要滿足林教授提出的兩個條件：一是符合現代化的價值導向，有利於民主制度和自由思想的安排；二是傳統的質素能在轉化過程中進一步得以創造性的落實，保持其文化上的認同<sup>③</sup>。這兩種合法性——價值的合法性和歷史的合法性——成為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同時落實的要素。

因此，「創造性轉化」無疑是在現代化價值導向之下，理性地尋求、重組現代化本土資源、並建構現代化經驗事實的過程。這一過程的複雜性是那些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們所遠遠不能預見和想像的。

## 價值導向和自然演化

卡爾·波普(Karl Popper)曾經提出經驗主義的漸進工程和唯理主義的烏托邦工程這兩種社會工程的區別，那麼，「創造性轉化」究竟是屬於那一種社會工程？從「創造性轉化」所必須借助的傳統資源來看，當屬於漸進社會工程無疑，但是漸進社會工程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在價值取向問題上保持沉默，將「目的置於技術領域之外」，即使涉及到各種目的，也僅僅考察它們是否相互衝突或能否實現而已<sup>④</sup>。而「創造性轉化」帶有鮮明的現代化價值趨向，離開了那個導向，也就失去了其全部的意義。

問題不在於「創造性轉化」究竟是屬於這個還是那個，因為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們提出經驗主義和唯理主義、漸進工程和烏托邦工程這幾組對比性的概念，其所賴以支撐的經驗性語境同樣是西方的現代歷史(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是上述兩種工程的典型範例)。對於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來說，已非這些概念和範例所能區分。中國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在「落後就要挨打」的現實刺激之下，現代化成為幾代中國人不言而喻的終極目標，歷史的發展從大處來說已經脫離了原先自發的、自然的軌

迹，而帶有明確的示範性導向和烏托邦理想。

不過，具有烏托邦導向的社會工程，並非必然是理性設計的。所謂唯理主義的烏托邦工程，除了要有追求的終極性目標之外，還必須具有整體主義的、全盤性的社會改造計劃，即所謂「根本解決之道」。從康有為一代戊戌變法的開明士大夫到「五四」以後各代知識份子，都無不在理念中尋求這種能夠最終解決問題的救國之「道」。1949年以後共產黨執政，使整體主義的理念得以付諸實踐，中共通過強大的行政力量，大規模地推行全盤性的社會改造計劃，從自然山水的重新安排到人的靈魂脫胎改造，最後的結局卻恰恰是南轅北轍，走向了終極目標的反面。

如果「創造性轉化」也以這樣的整體主義方式加以安排落實，勢必難免重蹈上述的覆轍。但林教授已經指出「創造性轉化」不是一個藍圖，它僅僅指引發展的方向，而不具體指導各項發展的細節和步驟<sup>⑤</sup>。這就意味着「創造性轉化」有可能是這樣一個有所變通的社會改造工程，它既有明確的終極發展目標，同時又拒斥任何整體主義的理性設計，在既定方向（這一方向不是人為設計和安排的，而是整個人類文明變遷的大趨勢使然）導引之下，通過外部環境的開放和轉換，使得已有傳統中的正面資源自發地實現從功能到性質的轉化。

一般公認，本世紀10、20年代和80年代至今，是中國現代化發展較快的兩個歷史時期（在台灣則是60年代到80年代）。而上述兩段時間恰恰是國家理性設計能力最薄弱或趨向薄弱的時期。當自上而下的整體主義理性設計處於無能為力或無所作為的時

候，來自社會自身的創造力、選擇力和試錯機制就會自發地發揮功能。在開放、變革的環境之中，一些傳統的因素會漸漸地趨向「創造性轉化」。比如，80年代以後，中共對鄉村底層的行政控制日趨淡化，於是傳統的宗法組織在鄉村再度復蘇，以發揮其血緣和區域的整合功能。這樣一種十分傳統的社會組織，在商品經濟比較開展、人口流動比較頻繁的地區，已經初步承擔了一些區域性自治和管理的功能。而且其內部的決策程序和與外界溝通的方式，也受到現代組織方式的示範影響，初步具有民主化、合理化的趨勢。這些功能的出現並非出自官方的理性設計和安排，而完全是順應社會變化的自然演化結果。可以設想，隨着傳統功能的減少和現代功能的遞增，宗法組織將會自然而然地「創造性轉化」為現代中間組織。

這裏將出現一個有趣的悖論：在具體的微觀領域，當人們越是刻意地追求現代化，迷戀於理性主義的主觀設計時，結果將越是適得其反。而尊重事物本身的內在邏輯，任其自然發展，在開放的環境下追求自身的合理性，倒有可能無心插柳柳成蔭。以學術文化領域為例，近一個世紀以來多少知識份子以重建價值為己任，竭力建構各種各樣的話語體系，但至今為止仍然沒有哪一個體系真正實現了「創造性轉化」。相反，在文學藝術領域，由於那些文學家、藝術家未必將外在的現代化目標時時刻刻掛在心頭，而只是為藝術而藝術，遵循藝術的自身邏輯，在一個開放的、與世界對話的語境下追求藝術的臻境，結果海峽兩岸在電影、攝影、音樂等領域，都有一批足以與世界對話和溝通的「創造性轉化」的成功範例。

中國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在「落後就要挨打」的現實刺激之下，從康有為一代戊戌變法的開明士大夫到「五四」以後各代知識份子，都無不在理念中尋求能夠最終解決問題的救國之「道」。但最後的結局卻恰恰是南轅北轍，走向了終極目標的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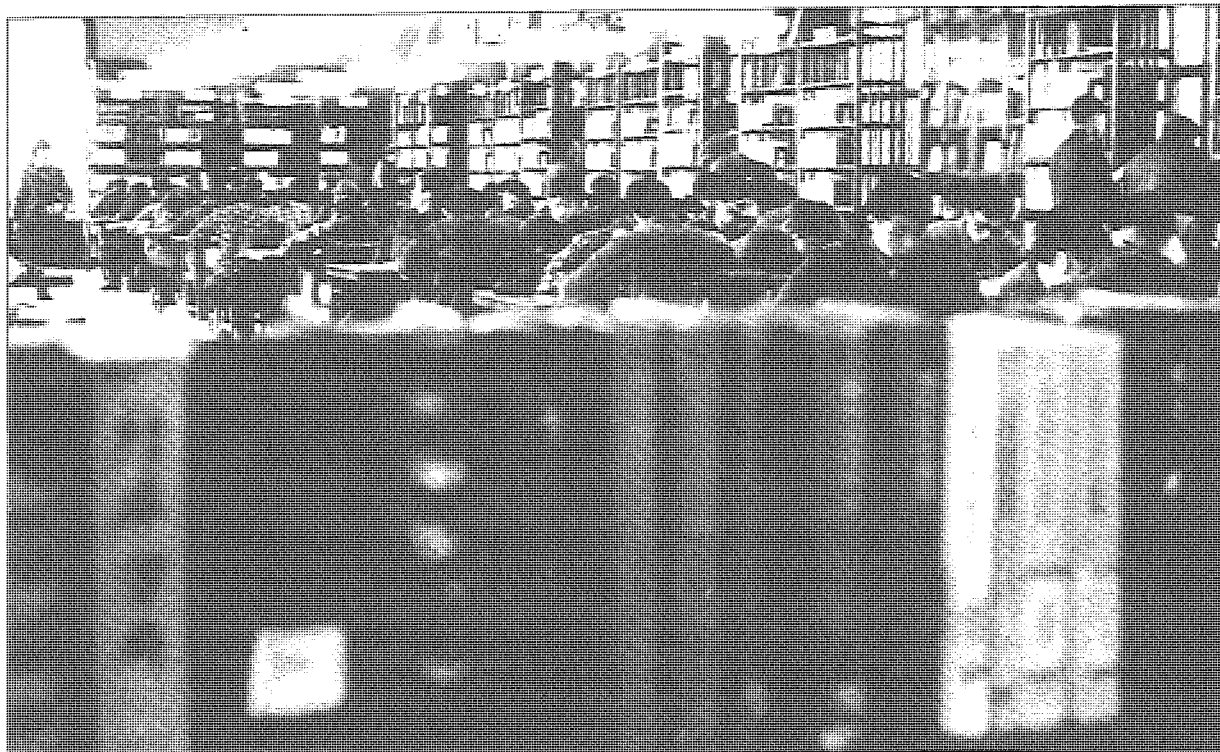
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創造性轉化」作為一個現代化發展總的路徑，當然有其鮮明的價值指向，但落實到具體的層面，指向並不能替代事物自身的發展邏輯。最明智的恐怕還是無為而治，為各個領域的「創造性轉化」提供開放的、多元的歷史大背景(所謂「導向」也僅止於提供這樣的背景，而非越俎代庖，參與具體的「轉化」設計)，形成社會試錯機制，讓既有的傳統因子在一個充分競爭的環境中自然發展，以篩選出足以在開放世界中實現合理化功能的要素，而正是這些自然生長的要素是最具備「創造性轉化」潛質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改造是如此，文化思想的變遷同樣如此。知識的關懷如果失去了人文關懷的指向，自然「轉化」不出現代的知識；但人文的關懷只有最終落實於知識的關懷，並尊重知識自身的積累、傳承和開新，而非過於計較一時一地的外在

目標，才有可能在價值上為現代化提供真正有意義的精神資源。

## 比儒學重要的是近代 以來的新傳統

在討論「創造性轉化」時，還涉及到一個何為「傳統」和甚麼樣的「傳統」資源可資轉化的問題。以思想史為例，說儒學是中國文化最大的傳統固然不錯，海外學者多從儒學遺產的內部發掘可能具有的現代化因子，也不失為一種創造性闡釋的工作。不過，從多元的思維來看，中國文化傳統之中不僅有儒學，而且還有道家、佛家、墨學等等，還有一些未上升為理論形態的民間文化。這些文化傳統裏面都有可能含有可資轉化的現代化因素，像陳鼓應先生前些年所做的對老子、莊子的研究，對發掘道家的自由

「創造性轉化」作為一個現代化發展總的路徑，當然有其鮮明的價值指向，但落實到具體的層面，指向並不能替代事物自身的發展邏輯。最明智的恐怕還是讓既有的傳統因子在一個充分競爭的環境中自然發展，以篩選出足以在開放世界中實現合理化功能的要素。



思想以及現代轉換的可能性，就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然而，至少對大陸來說，經過一個世紀以來接連不斷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反傳統，這些曾經顯赫一時的古代思想遺產在當代中國人這裏已經是相當陌生了。以儒學來說，儘管我們可以說它仍然存留於中國人的深層思想模式、行為方式和人際關係之中，而且在國家意識形態結構之中也有它的殘餘物。但作為一種顯性的文化符號，它確實與當代中國割斷了歷史聯繫，這點與西方的基督教有很大的區別。基督教儘管在當代西方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那裏失去了它的信仰基礎，但它依然作為一個有形的存在，繼續對西方社會和精神發生着巨大的影響。它的根始終沒有斷。但儒學在五四以後的中國卻斷了它的精神命脈。一個傳統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作為「克里斯瑪」(charisma)在現實精神秩序和社會秩序中的道德感召力和規範力。但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古老思想傳統在這一點上早就退出了歷史舞台。今天一些知識精英致力於傳統思想遺產的梳理和重釋，這在學術上的意義自不待言，在價值重建方面也許可以通過拯救這些古老的思想傳統，為現代化提供一種可能的學理資源。但我們切莫將這種學理工作的意義過於放大，以為就此可以奠定現代化的思想基礎。因為這些工作即使成功，其影響也僅局限於狹隘的知識精英圈，而與對孔孟學理不甚了了的一般民眾無涉。

傳統是不斷發展的，有些傳統衰落了，但有些東西經過幾代的延續卻演變成了新的傳統。近來海內外學術界開始注意到並着手研究近代以來中國形成的新傳統。以思想文化領域為

例，這些新傳統包括對中國歷史產生過，甚至繼續產生着巨大影響的各種社會思潮，比如民族主義、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科學主義、理性主義、人文主義等等。這些思潮在其開始，無疑是「新生事物」，但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它們在當代中國文化譜系中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了顯學，在各自的社會群體中具有不可小覷的「克里斯瑪」內在權威。與古老的儒學相比，它們直接地影響着當代中國人的信仰選擇、價值體系、思維模式和行為準則。而諸如儒學、道家這些古老傳統，只是通過或者借助於這些新的傳統才隱性地、曲折地發揮着功能。

既然「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命題的真正意義在於現代化的變遷不能中斷歷史，而只能從既有的傳統之中創造性地轉換出來，那麼我們就大可不必迴避這一真正對當代中國發生着現實影響的新傳統，而僅僅從古老的傳統那裏去發掘現代化的資源。多元的態度不僅意味着對各種古老傳統的開放，更重要的是面對這些活生生的新傳統，否則的話也同樣會重蹈「全盤反(新)傳統」的覆轍。這些新傳統形成之本身，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思想重建過程的一部分，其中不少成果頗具有「創造性轉化」的意義，我們沒有理由棄之不顧，樣樣工作都要回溯本源，從頭做起。固然，儒學這樣的古老傳統儘管在顯性的現實意識結構之中已無影無蹤，但因為其淵源流長，已經化為「不言自明」的「支援意識」繼續存在，然而即使要「創造性地」轉化它(不是在學理意義上，學理上無此障礙，而是指作為一種成為大眾價值體系的「支援意識」的轉化)，也只能從它的依托物、顯性的現實意識結構

近代以來中國形成的新傳統，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思想重建過程的一部分，其中不少成果頗具有「創造性轉化」的意義，我們沒有理由棄之不顧，樣樣工作都要回溯本源，從頭做起。

入手，而鮮有其他途徑。

因此，「創造性轉化」的對象除了儒學這樣的古老傳統之外，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業已形成的各種對一般民眾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新傳統。像從嚴復開始到胡適那裏發揚光大的現代自由主義思潮，在二十世紀中國儘管處於邊緣地位，但一直綿延流長，至少在知識份子那裏成為一種新的思想傳統。如何接上這一度中斷的傳統，並加以進一步的充實，使之成為當代社會多元價值觀的主流，其重要絲毫不亞於儒學再詮釋的工作。再如，海外學者頗多微詞的馬克思主義，本來是西方的舶來品，但經過中國本土化以後，在大陸曾經一度像儒學一樣成為至高無上的國家意識形態。其作為意識形態符號自然不足取，但在其學理形態的原型之中，卻不乏許多具有現代化導向的資源，像《共產黨宣言》裏面提出的「個人自由發展」的「聯合體」設想，就可以為重塑現代市民社會提供很好的理論資源。作為一種社會批判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存在也有助於現代化變遷的平衡發展。當然，經過80年代的思想解放，意識形態化的馬克思主義如今在大陸僅僅剩下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但它畢竟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具影響的新的思想傳統，至今在大陸日常生活中仍然殘留着它強大的能指系統。倘若我們超越意識形態的偏見，正視這一現實，就應該承認將它的一些正面內涵加以重新闡釋，也是「創造性轉化」命題中應有之意。事實上，70、80年代的大陸思想解放運動，不正是從重釋馬克思主義開始起步的麼？

不唯思想傳統，即使是社會結構的「創造性轉化」亦是如此。一個具有

市場經濟導向的市民社會，不可能從回溯古代的民間社會中建立起來，而只能在現行體制的自然的、和平的演變中重建。像當今大陸正在發生的國營企業股份化、官辦團體民間化、大眾媒體非意識形態化等這些社會經濟組織的變化，無一不是在大的改革開放背景之下，借助現存體制的資源，先是實現功能和職能的轉換，可以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將完成自身性質的轉變，最終構成一個作為民主自由制度基礎的現代市民社會。這是一場每天都在發生着的激動人心的歷史性巨變。這一巨變決不是人為設計的，恰恰是按照歷史發展的自身邏輯，通過現行體制的自然演變改變着既有傳統，並為中國的未來創造着新的傳統。

「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是個好命題，它在學理和操作層面上留下的可「創造」空間應該是開放的。這種開放不僅將把現代化的普遍理念與中國古老的和現代的傳統資源聯結起來，而且也將通過歷史的自然演進，創造出一個具有本土風格的現代化經驗事實。

#### 註釋

① 許紀霖：〈儒學的「克里斯瑪」和創造性轉化〉，《思想家》叢刊（上海：華東化工學院出版社，1988）。

②③⑤ 林毓生：〈「創造性轉化」的再思與再認〉，《知識份子》（美國），1994年秋季號。

④ 卡爾·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頁50。

許紀霖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

「創造性轉化」的對象除了儒學這樣的古老傳統之外，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業已形成的各種對一般民眾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新傳統。